

N 本期聚焦

机会的公平和规则的公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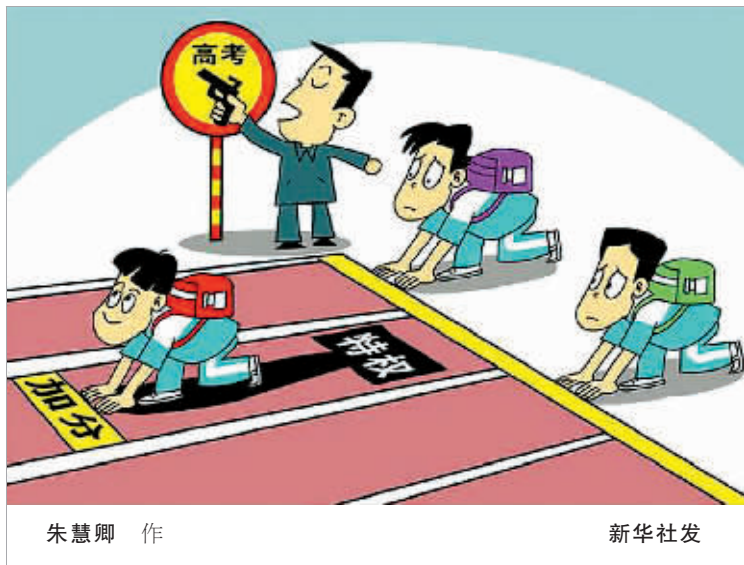
徐梦秋

党的十八大提出“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强化规则意识”“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为了实现这一重要任务，在理论上厘清“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三者各自的内涵及其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机会的公平是参加某种活动的权利公平，如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公平，就是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公平。如果机会无限多，人人都可参与，就不会有对机会的争夺，也不会有机会公平的呼声。在机会有限，机会成为稀有资源的时候，如何来配置机会并保障机会的公平，就需要有相应的规则出场。换言之，机会是一种权利，获得机会就是获得参加某种活动的权利，这种权利应由相应的规则来配置和赋予，而不能由特权来赐予。

例如，参加世锦赛链球决赛的权利，对于链球运动员来说就是一个极其宝贵的机会，各国运动员为了获得这个稀有的机会，会展开激烈的竞争。哪些运动员才能获得决赛权？这是由链球世锦赛章程的有关条文规定的，凡是符合这一规则的，都可以获得参加世锦赛链球决赛的机会。这就是机会的公平。公务员职位也是一种稀有资源，哪些人才有参加公务员考试的资格？这也是由相应的规则来配置和赋予的，凡符合规定者都有参加考试的资格和机会。

这也就是说，参加某种活动的机会或权利，应由相应的规则来配置或赋予。由于机会是由规则来配置和赋予的，规则的公平对于机会的公平就具有决定性的



朱慧卿 作

新华社发

意义。不公平的规则必然破坏机会的公平。例如，在工程招标前，针对某建筑公司的特点，设置相应的条件，使得不具备这一特点的其他企业不能参与竞标。在此，不公平的规则通过剥夺部分竞争主体的参与权，破坏了机会的平等。

可见，规则的公平是通过配置机会或者说赋予权利来形成机会公平的先决条件。在机会配置的过程中，规则公平对机会公平的作用，具体说来就是：保证人们参加某种活动的准入资格平等。所谓的准入资格平等，按笔者的理解就是，具有同等资质的主体，包括个人和组织如公民和企业，都应有参与同样的活动的权利。规则的公平，不仅在机会稀缺的情况下，对于保证机会的公平即参加某种活动的权利平等是不可或缺的，即使在机会充裕但因某种原因仍需对参与权进行限制的情况下，也是必须的。

如果说规则在机会配置阶段对机会公平的保障，是通过赋予同等资质的竞争主体以同等的参与权来实现的，那么，在后续的

参与活动的过程中，规则对机会公平的保障，则体现在对竞争主体的义务的规定上。规则关于义务的规定有“肯定”与“否定”即“必须如何”和“禁止如何”这两种形式。肯定形式的规则规定参与者有做某事的义务，否定形式的规则规定参与者有不做某事的义务。前者如“工商企业必须依法纳税”；后者如“不得出售过期变质的食品”“严禁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在有的情况下，肯定形式的规则和否定形式的规则也会“联袂”出台，如“必须履行纳税的义务，严禁偷税漏税”。

通过规则提出种种“必须”和“禁止”，目的在于保证所有的竞争者在撤去实力的差异之后，胜负的机率相等。如果有竞争主体不履行规则所规定的义务，如企业漏税、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候选人贿选，就会破坏胜负的同等概率，使得作弊者胜出的概率提高，从而也就破坏了机会的公平，进而破坏了结果

可见，机会的公平，不仅仅是具有同等资质的主体都有参加某种活动的权利，还必须使所有参与者在撤去实力差异的情况下，胜负的概率相等。如果仅有第一点，而没有第二点，那还不是完全的机会公平。

如果说规则的公平是形成和保障机会公平的关键，那么，如何才能制定公平的规则呢？规则的形成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约定俗成的，它可能是不成文的规则，但其公正性已被公众所认可，这种规则只要不与社会公德和法律规范发生冲突，就是合乎时宜的，不应随意干涉。还有一种规则是由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现时代的权力机构，如立法机关，必须通过民主、协商的程序，在充分反映所有竞争主体的共同利益而不是少数主体的特殊利益的基础上，制定规则，才能保证规则的公平，进而保障机会的公平。如果规则的制定偏袒某一方，那就必定会破坏规则的公平，从而也就破坏了机会的公平。因此，民主决策、民主立法对一个国家而言是必须的，规则公平的实质就是通过程序民主达到实质正义。

如果说机会的公平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首要条件，那么决定机会公平的规则公平就是发展市场经济的根本条件。所以说，市场经济一定是规则经济和法治经济。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今天，我们必须向改革要红利。而向改革要红利，就必须改革或废除各种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就必须改革或废除那些受到某些特殊的利益和权力保护的不公平的规则，全面地确立规则的公平和机会的公平。也唯有如此，才能使所有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地发挥出来，在平等有序的竞争中，形成“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新局面。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来源：光明日报

N 学有所思

建设特色区域文化与增强宁波文化影响力

方同义

一个地方的区域文化，是人们在不同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下，经过长期的生活实践而形成的明显与地理位置有关的文化特征。这种区域文化自然而然地对该区域各个领域产生多种多样的影响，成为该地域生产生活在精神支持、共识凝聚、价值指引、行为规范等方面的无形力量，也会对外地域在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中产生多方面影响。

由此而言，区域文化影响力是软实力的一种，体现在其对社会各个领域有“文化+”的作用。具体而言，包括区域文化对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维护作用；区域文化对该区域政治生活的影响引领作用；区域文化对该区域人口素质的培育与影响；区域文化对该区域文明成就和水平的奠基性作用；区域文化对其他异域社会的扩展渗透作用，等等。

宁波传统文化丰富多彩，底蕴深厚。有先进的浙东学术文化。浙东虽地处边缘，然而浙东籍学人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非常了不起。浙东学术少官学色彩，不仅是民间的，而且是先进的。明清中国学术史上的几个坐标点，都是浙东学人开创的。浙东学术不仅在国内占显要位置，而且在国外包括东亚的日本、朝鲜，都有很大影响。宁波是浙东学术的最重要基地，在浙东学术史上宁波籍学人及其著作具有不可撼动的重要地位。有富有活力的宁波商帮文化。宁波人富有商

与培养等，尚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又如，有关文化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需要更新，文化的核心价值，惟有进步的崇高的价值，才能引领文化文明的健康发展，如何突显宁波区域文化的特色，确定宁波精神价值的重心，则需要我们有长远眼光和深刻思考。再如，在区域文化建设实践中，如何运用政府的力量，又如何调动民间力量，使之相得益彰等。

进一步建设富有地方特色的宁波地域文化，发挥文化影响力和软实力，应当从下述方面入手：

一是凝练区域文化精神，为区域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宁波城市精神的概括提炼离不开浙东学术文化、宁波商帮文化、港口贸易文化等为基调的既有文化资源。2005年，市政府将宁波城市精神确定为“诚信、务实、开放、创新”。但宁波城市精神的界定，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人们的生活是生生不息的，社会发展不断呈现出新特点、新要求，社会文化生活会出现新面貌，因此，城市精神应不断重新审视，有所更新。

二是发展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实现经济文化融合发展。发展宁波的文化产业，需要系统全面地规划，综合各种因素统筹考虑。首先，准确把握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实现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必须深刻认识文化发展的规律性，遵循文化自然演进过程，使市场规则始终占据文化发展的基础性地位，将文化的发展和生产与一般工业生产、物质生产区别开来。文化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多样性和差异性，遵从文化的这种特点，最需要做的是

N 观点集粹

寻求“硬风险”与“软风险”的治理交集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清甫在新华网刊文指出，社会问题的网络化表达，“硬风险”转移成“软风险”，或者说“硬风险”软风险化，这种变化趋势是中国社会治理空间受限或问题解决不畅造成的。社会治理和舆论治理不能在两条道上平行展开，而应该结合起来，且需要在二者之间找到

一个最佳切口。在理论层面，要找到社会治理和舆论治理的内在规律；在实践层面，将社会治理与舆论治理有效结合起来，打破社会治理的维稳惯性。社会治理不当引致的“硬风险”，经常会成为舆论“软风险”的风险源。河床不整治好，河水就难以平静。社会治理也罢，舆论治理也罢，根源在社会“河床”之上。

互联网企业不能用“平台论”开脱

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互联网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田丽在《人民日报》刊文指出，对于为什么要增强社会责任意识，有的互联网企业还没有充分认识到，有的认识不全面，有的习惯于用“平台论”为自己开脱。应当看到，增强社会责任意识是由互联网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决定的。

当前，互联网已经深刻嵌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人们生活的一个新空间。互联网企业是这个空间的主要建设者。当互联网技术无孔不入、社会离不开网络的时候，互联网企业就应当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让伦理与道德、秩序与制度的风险源。河床不整治好，河水就难以平静。社会治理也罢，舆论治理也罢，根源在社会“河床”之上。

改善旅游供给要“加减乘除”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熊元斌、肖鹏、孙冬在《光明日报》刊文指出，推进旅游业供给侧改革，要以市场为主导力量，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为核心，开发和打造高质量、多样化的旅游产品，改善和提升旅游服务质量，优化旅游发展环境，提高旅游供给水平和游客满意度，推动旅游业快速健康协调

可持续发展。如何达到？第一，做加法，补齐短板，扩大要素供给，发展新兴业态，提高增长质量与效益；第二，做减法，简政放权，清除过剩产能，松绑减负，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第三，做乘法，以创新发展理念挖掘发展新动力，培育增长“乘数因子”，以“几何式增长”推动发展；第四，做除法，清除旅游产能过剩，扫清前行障碍。

现代大学治理需要“高超智慧”

重庆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生导师、副教授白强在《光明日报》刊文指出，大学治理智慧就是大学治理之道，就是大学治理的规律。作为“道”，它是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作为一种思维观念形态的存在，它又是可感知的，而且是可以指导行动并发挥巨大作用的。从这个

意义上讲，现代大学治理需要的“高超智慧”，就是要按大学的逻辑去办学治校。学到的知识、思考的观念仅仅是一种思维形态的存在。而要把这种思维形态的存在转化为现实的推动力量，还必须付诸于鲜活的现代大学治理实践，并在治理实践中自觉检验、不断修正和完善原有的知识和观念体系。

N 学者观察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府如何“有所为”

吴敬琏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当前的重点是“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用经济语言说，就是实现资源的有效再配置，通过市场竞争，使得有限的资源从效益低的、供过于求的企业和部门流出来，流向效益比较高的供不应求的部门去。市场来做这件事是最有效的，但是现在很多地方还是热衷于由政府做：用下指标的方法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也是由政府机构决定，要发展哪些产业，用什么技术路线，政府给补贴、给扶植、给贷款。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去做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另外一个降成本，或者还有去杠杆，许多地方也主要用行政命令下指标的办法。其实这些事情都应该由市场通过奖优罚劣、优胜劣汰去做，市场可以做得很有效率。

政府要做什么呢？三中全会说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个“更好”是跟谁比呢？是跟过去的做法比。习总书记在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明里说，核心问题是在资源配置中到底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还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所以政府起作用的时候有所不为有所为，有些事情不能干，不能直接组织融资，直接操办项目，不应该去指定技术路线。我常常看到一些部门的领导同志，或者是地方上的领导同志，到企业去就告诉人家“这个技术好，你们搞这个

技术”。他怎么能知道哪个技术好？不要说官员不知道，企业家其实也不知道。这都应由市场决定，由市场判断。政府不要违法设定行政许可，不要违法设定市场准入。反过来说就是要赶快推行负面清单制度，不要干预司法，实行地方保护，不要对个别企业实行政策倾斜，破坏竞争的环境。政府给高新技术企业很强的政策倾斜与扶助，好像看起来很好，但扶助了此产业，打击了千千万万其他产业。

政府应该要做一些事情，应该“有所为”，问题是在哪些方面有所为？政府的基本功能是提供公共品，比如说好的制度、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基本的社会保障，还有良好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教育和科研，特别是一些基础性的教育和基础性的科研是有外部性的、引领性的，企业很难去做，这是政府的责任，也应该去做。在市场发育程度比较低的情况下，有一些微观的事情可能也需要政府介入，但要讲究方法。

还有一个是规划。规划要提供一种预测性的信息，不是计划的规划。既然成败的关键就在于推进改革，现在有一个问题一定要防止。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最先提出，就是文件发得太多，落实不够。他叫“冰上开车，空转”。我觉得他指出这种现象必须要改。中央领导在最近好几次深改小组的会议上，反复讲“要拧紧螺丝”，把改革的主体责任落实到位，让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各项改革决定落地生根。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北京日报



宁波走书

林绍灵 绘

业天赋和经商才干，“宁波帮”是相续百年、最为成功且古老而常新的商帮。“无宁不成市”充分表明了宁波帮的突出地位。另外，宁波在中外贸易港口文化、青瓷文化、藏书文化、宗教文化、建筑文化以及多彩的民间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骄人成绩。

可见，宁波传统区域文化无论在广度、厚度等方面，都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宁波正在建设富有活力的现代文化街区。近十余年来，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建设，广大干部群众的文化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高涨，文化专业人士苦练内功，贡献了不少精品名品，宁波文化呈现出富有活力而且颇具潜力的发展状况，大大增强了宁波的知名度、美誉度，提高了宁波文化在全国的地位，显现宁波文化的非凡活力与魅力。

然而，宁波的文化建设如何显示自己的区域特色，避免落入千城一面的窠臼，尚有许多工作要做。例如，宁波传统历史文化在一些领域的传承保护不可盲目乐观。像甬剧，人才的缺失，青年演员的断层，观众老龄化，现代消费文化的冲击……这一切都在剥蚀着这个古老的剧种；又如，宁波的不少老字号面临生存的危机，有的已经成了遥远而亲切的记忆，有的惨淡经营。又如，区域文化特色有待进一步突显，宁波是有名的“工商城市”，现在又要建设“文化强市”，二者如何协调？如何体现特色？又如，宁波区域文化创新有待提升，创新是区域文化发展的驱动力，文化创新机制的形成、文化创新人才和文化杰出人才的扶植

认同、包容和多元。切实处理好市场导向与政府管理的关系，目的是实现以社会效益为主、兼顾经济效益的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其次，注意发展宁波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将建设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与作为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文化强市建设融合起来，因地制宜，走自己的路。注重人文景观建设，塑造城市形象。继续建设好历史文化保护区和富有文化特色的老街区。要在打造文化名人、名品、名镇（村）、名节中提升宁波美誉度。宁波企业家和文化人要有长远眼光、宽阔胸怀，沉下心来，多出名品精品。再次，以创意为核心积极培植高新技术文化产业，以良好环境吸引人，激发创意，使富有创造力的奇思妙想喷薄而出，使创新创业成为常态。汇聚文化精英，强化文化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对于文化的迫切需求。

三是大力发展文化事业以提升区域精神文明发展水平。以提升宁波人精神品位为核心发展文化事业，始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放在首位，进一步夯实宁波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大力宏扬以浙东文化为主干的优秀传统文化，使之家喻户晓；使诚信、文明、慈善、崇学、向善等价值理念和道德品质蔚为风尚，“做文明有礼的宁波人”，使市民精神品位有较大提升；以满足广大市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发展文化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文化发展是为了人民，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宁波大学软实力研究中心)